



旅游是无烟的工业,它对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这一业态的保护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我国,随着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家门,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飞到了国外,领略世界各国的美好风光。国内外旅游生活使当代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生活体验。在中国旅游事业大发展击掌叫好的同时,也不能不思考如何建设 21 世纪中国旅游文明的问题。

中国内地的许多地区通过旅游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政府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中国人在民生活中最重要节日的休息时间调整为七天,于是“黄金周”的概念应运而生。“黄金周”推动了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扩大了内需,对 GDP 的增长功不可没。但“黄金周”旅游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效应。旅游时间的过度集中,交通道路和旅游景区不堪重负,为人们所诟病。拥挤不堪的景区游览,不免大大影响人们的心情,以致容易出现一些偏激的行为;旅游中生活设施的紧张,又会成为旅客和有关方面发生矛盾的导火线;再加

上见利忘义“一刀见血”的导游……旅游文明的建设需要法规、政策的支持,最近国家出台了新的“旅游法”,对于规范旅游行为,建设旅游文明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但在具体实施中还会面临不少新问题,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

旅游者的形象,不仅是个人的文明素质表现,也是国家文明水平的表现。要建设 21 世纪中国旅游文明,必须推动旅游者个人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进入 21 世纪以后,更多的中国游客跨出了国门,实现了自己的旅游梦想。而欧美的许多国家,经济不景气,特别欢迎

更多的中国旅行团到他们的国家游览、观光和购物,他们甚至把中国游客称之为“会走路的钱包”。不少国家在签证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吸引中国游客。但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出境游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情况。一些中国游客在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方面的不文明行为被国外媒体所曝光,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旅游文明素质能否提高,尤其需要依赖于公众个体的道德自觉。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做一个堂堂正

正的中国人,要有民族的尊严和骨气;做一个体面的中国人,要将文明礼貌时刻放在心上。文明行为往往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却构成了一个人直观的、外在的形象,直接影响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评价。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脱离了土地的更多国人加入了城市生活,如何学会过公共生活,这就要有更多的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方面的教育。旅游文明中的道德修养建设,也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在大数据的时代,为了

促进道德自律,并更好地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建议通过数据记录来反映旅游者和旅游经营单位对旅游文明的建设情况。“记录在案”,是对当事者的警示和教育,以促进当事者的反省,其产生的效果是对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补充和完善。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承担这些工作并非难事。关键是要下决心,建立旅游文明建设的信息系统。只要假以时日,其成效是会凸显出来的。总之,政策法律、道德修养和信息系统多方合力,中国的旅游文明建设才可能跨上新台阶。

关于“土豪”那些事

叶开



流行词手册

这个时代,汉语呈现加速增殖发展的态势。一个人半年不在中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是外国人。细数一下今年到现在为止的九个月里,有多少新词昙花一现,有多少旧词获得新生啊——例如“土豪”。

我们这些从小学着革命教材长大的接班人,一定对“土豪”这个词记忆深刻。后面还常常跟着一个词“劣绅”。两个都是贬义词,是形容坏蛋的。词义上看起来很令人讨厌,实际上当上了“土豪”的人命运相当悲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民群众最喜欢做的是“贫民”。那个时候,谁家如果是三代赤贫,甚至像周立波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塑造的“赵光腚”那样一家子共穿一条裤子,那才是根红苗正的新社会主人。那时候,你要不說你自己穷得叮当响,都不好意思出门。

天下大势,三十年河东,一杯浊酒喜相逢。谁想到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脚的“土豪”,披着灿烂的资本外衣再度出现,并且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呢?

现在跟三十年前不一样,“土豪”成了褒义词,“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成了口头禅,“当土豪”成了不少人的公开理想,打着灯笼找“土豪丈母娘”成了吊丝们争相学习的秘笈,“土豪金”是苹果公司实实在在的用来抢钱的秘密武器,“土豪很忙”在十月长假生动地演绎着。关于“土豪”那些事,你在网上一搜,简直是成百上千,脱屏而出。

文字看着是一种书写

符号,词语看着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同样的文字组成的词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词性,却展示出极其耐人寻味的变化。这些,其实值得语言学家去好好研究。

我读大学时最讨厌语言学上的两个词“能指”和“所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手指和脚趾。那时我自以为是地想,为什么不能翻译成“符号”和“内容”呢?虽然听起来很“土豪”,但是我辈汉文化语境下的学生或许更容易明白。但语言学家翻译成这样,自然有它的道理。

简单地用“土豪”来解释,所谓“能指”就是“土豪”这个词本身,“所指”就是那些蹦跶得正欢的“土豪、土豪金们”。同样的“土豪”在三十年前,夹着尾巴灰溜溜做人,走路贴着墙缝,现在,他们开着超豪华跑车,举办着超豪华婚礼,赠送着超豪华礼物。人的价值,被这些礼物所取代,又令人想起另外一个经典的词:异化。

一旦人的价值产生“异化”,那么你作为人的价值就被抽空了,你就相当于这个物,你“物化”成了“土豪金”手机,超豪华跑车,狗链一样粗的金子,你成为了你所佩戴的物。如果这个物不存在,你的价值将随之消失,一无所有。

所以,有人说,那个得到丈母娘赠送价值四百万的超豪华跑车的新女婿倒地叩拜的不是丈母娘本人,而是四百万。金钱长驱直入,皆因你的人生毫不设防。

也所以,很让人怀疑那些“天长地久”“永永远远”之类的“能指”会不会跟“所指”完全风马牛不相关。

大楼、大师、大口号

朱绩崧



北窗絮语

七天长假结束,我回到大学课堂,又开始对座中学生滔滔不绝。教学楼内走廊里留学生谈笑喧闹,楼外助动车防盗警报此起彼伏,我时不时要停下,喘口气,再与这两股噪声一争高下。下课铃响那一刻,神困力乏,心中浮现出四个大字:“世界一流”。

就在国庆节前夕,本市某大学提出将在 2020 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当然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但网上一搜,原来该大学虽名动海内,却不是首家提出要“世界一流”的。颇有几所外省的二线大学,前些年就在嚷嚷着要跻身哈佛、耶鲁之侧了。这就不禁让我怀疑,现在是不是在高校之中,刮起了一阵超英赶美的跃进风?

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跑过一些地方,见识过几所大学,带我参观的同志常常自豪地说起:“这是目前全亚洲最高的教学楼”、“咱这食堂同时能容纳三千人就餐,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等等。望着他们一脸的骄傲,反倒让我忆起牛津、剑桥的低矮与冷清。堂虎特大,于大学是最显眼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呢?每当站物。如果这个物不存在,你的价值将随之消失,一无所有。

太现实的。那就干脆把楼造踏实吧。可我碰巧看到的,却常常是投入使用没几年,这里渗水,那里开裂,极端者竟成危楼,甚至还有用合成塑料偷换大理石,伪装罗马式大立柱的,供于大堂之内,美其名曰“立志柱”,令吾侪观者抚之摩之,啼笑不得。

大楼要造,要造好,但同时也注重出大师,出真大师,倒不失为一良策。但“大师”这种东西,最大的麻烦,大概就是不可批量化、按部就班地生产吧。教育主管部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培养优质科研人员的效率委实不能算高,于是别出心裁,大搞引进。海归回来就各种土豪级的配套,房啊,车啊,职称啊,工资啊,什么都高人一等。于是,土鳖们所受的冷遇,变相确认了我们的大学其实是默默认输了:自家的产品,比不过人家。此等形势下,对师资的成长还不断苛以条条框框,从以往各显神通的“人”治变为现在铁面无情的“数”治。权威、核心、SCI、国家自科社科,复与校内外待遇勾连挂靠,俨然构筑起了一座新八股的贡院。试问,如此这般又如何出得了精神自由、意志独立的学术大师呢?没事,接着引进呗。可惜,重赏之下,却未必都是勇夫。有媒体报道称,留学人员回流率虽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受多种障碍的制约,高层次回流率仍处较低水平,甚至有的拟引进人才因为引进城市雾霾频发而选择留在美国……

如此看来,以“七年之痒”,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几分操之过急的冒进之嫌呢?当然,“一流”二字本无官方界定,前十、前百、前一千,任君取择。只是希望莫做成夜郎自大之梦才好。

波撼余姚,当政府无力回天

李泓冰



余烬录

大水围城五六天的余姚,一度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孤岛”。

在福建登陆的台风“菲特”,一路撒野,恶作剧般地重创了浙江小城余姚。“老天爷差不多把 68 个西湖的水倒到余姚头上”,台风、冷空气、大潮汛“三碰头”,余姚这回苦透苦透。当别的地方还沉浸在国庆黄金周的余温中,还停留在长假安排是否科学的争论中时,泡在水中的余姚人只能苦着脸望“洋”兴叹,甚至一度忧心饮食不给。

围绕泡在水中若干天,电力、通信、交通甚至饮食都难以为继的余姚,舆情经历了一个从淡定、关注到惊愕的过程。如何诠释余姚今天的悲剧,成了自媒体上喋喋不休的焦点话题。

余姚毕竟不是中西偏远县市。和那些一提就让我们口角噙香的浙江小城,如上虞、慈溪、奉化、嵊州一样,它美美地安卧于荷叶田田、小桥流水的江南。它还是全国十强县之一,有“最具幸福感城市”之誉,前年与全球其他三座城市一起,摘得“全球绿色城市”桂冠。这样一座小城,中了台风的当头一棒,水漫家园,波撼城池,让余姚人痛楚,也让我们心悸。

一个意味的争论是,风雨飘摇中的余姚之困,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天灾暴露了人祸,还是人力难以回天?批评政府者说:抗击台风预案不足?风暴雨警信息不畅?排水不力救援来迟——当地政府难辞其咎?甚至又习惯性地出现了已被证伪的流言,比如“溃坝”啊,“水库泄洪”未通知啊、“买几棵白菜就需百元”啊……

替政府抱屈者说:暴雨突如其来,天灾难以防范,余

姚的锅底式地形、水网纵横的环境,让它难以抵御突然倾盆而下的“68 个西湖”。不能把所有天灾的账,都记到政府头上。美国飓风还不是损失惨重,也没见老百姓一股脑地抱怨政府啊。

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从民众的抱怨中,读出一丝欣慰来:中国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大约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有事找市长、找政府,这成了民众的思维习惯。何况天灾人祸面前,尽最大可能防灾减灾、救死扶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没什么冤枉可言。何况中国的“全能政府”形象,是数十年行政权力包打天下奠定的——密度极高的各路资源集中于政府,唯政府所能调配;诸多“精英”经过重重筛选亦集中于政府,人均公务员比例居高不下;各种税费收入的高企,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这种种种都让民众遇到急难险重便寄期望于政府,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寄望政府,表明众望所归,甚至是民气所用,政府无可推卸,不可不懈怠,亦不可不惕惧。

然而,另一方面,天灾之重确实有时是人力所难以抵御。要稍卸“全能政府”的担子,一是让大家理性看待天灾,二是得从眼下各地的行政体制改革入手。该政府管的,责无旁贷;该市场管的,放权让利;还要有胸怀和雅量,培育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调节、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比如,在天灾人祸面前的民间的、专业的救援组织力量。

中国城镇化浩浩荡荡,波撼余姚或许只是偶发“小”事件,却藏着改革“大”文章。包打天下的政府,当无力回天时,不妨向改革要“药方”……